



茶陵铁堂,茶陵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旧址,前身为建于明崇禎十七年的湘江书院

焕然一新的新江书院

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合办

樟霞茶香

郭亮

“咚——”

闭目时总能听见这样的钝响。悬在屋梁上的巨木,裹着粗砺的麻绳,被几个光膀子的汉子一次又一次推着撞向铁箍。铁箍里裹着的是碾碎并蒸过的油茶籽,在重击下微微颤抖,金黄的油液汩汩流出,带着浓烈的清香,淌进木槽……

睁开眼,现实却换了轻盈的调子。这里是荷塘区仙霞镇的樟霞村,古树茶油坊里,一台电机低鸣着,齿轮缓缓转动,茶籽被挤压得吱吱作响,油液一点点渗出,顺着管道流进不锈钢桶中。没有悲木撞击铁箍的巨响,也没有粗犷的汉子大嗓门的调笑,取而代之的是机器的单调节奏和工人们低声的交谈。

我笑了笑,这联想并非空穴来风,而是源自儿时的记忆。老家村里榨茶籽油便是如此——人力、古法、喧闹而充满生机。而此刻,身处株洲,榨茶籽油,上大学的滋味。初入时,清香中带着一丝涩味,却别有一番韵味。也知道,相较菜籽油,这茶油的身价很是不菲。如今,应邀来到樟霞村,我终于得以亲眼探访这茶油的源头。

樟霞村不大,却整洁得让人心生好感。村道两旁绿树成荫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草木的清新。村后山中数百株树龄超百年的古茶树,是樟霞的骄傲,也是乡村振兴的根基。近年来,株洲市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,荷塘区作为核心区域,积极探索绿色产业与生态保护并重的路径。仙霞镇紧抓这一机遇,将古茶树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,樟霞村便是其中的缩影。

油茶村全身都是宝。油茶籽能榨油自不需说,油茶叶虽不如茶叶一样的

在沅县,年的味道,是从一缕热气腾腾的肉香开始的。当除夕的鞭炮屑铺满门庭,游子归家,亲朋聚会,此时的餐桌上,即便佳肴叠翠,若缺了那只硕大的青花瓷盆,这顿团圆饭便仿佛失了灵魂。这便是沅县人过年的重头戏——攸县蒸盆。

攸县蒸盆,寓意着“盆盆如意”。过年吃蒸盆,寓意着“盆盆如意”,这道菜也因此成了当地红白喜事、逢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头道大菜,更是攸县人待客礼仪中最高

的“见面礼”。

《攸县志》曾载:“攸水西流而清,故其民聪慧好文;溪回湍静,故其民柔顺好礼。”攸县人的“柔顺好礼”,在一道蒸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它不仅是一道菜,更是一种礼仪。

若逢贵客临门,蒸盆上桌之际,便是主人展露才情与热情之时。不同于一般的推杯换盏,攸县人保留着吟唱“赞词”的古风。若是春节团拜,主人家或许会高声唱道:“门

前喜鹊闹喳喳,看来真是大吉祥……风和日丽攸州美,攸县蒸盆表心意!”客人亦会即兴回敬:“客套不多说,只把蒸盆哩!”

若是遇上婚嫁喜宴,这蒸盆更是承袭了万福祝福。司仪指着热气腾腾的蒸盆,口吐莲花:“蒸盆上席好兆头,福祿寿喜纳八方!”虽是乡间俚语,却朗朗上口,将宾客尽欢的热闹气氛推向高潮。这种独特的餐桌文化,让攸县超越了果腹的层面,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与共鸣。

当然,能作为“餐桌地标”,攸县蒸盆的绝不仅仅是吉祥话,更是那历经千年传承的烹饪匠心。

蒸盆之美,在于“和”。它不倚重珍馐美味,所用皆是攸县本土最朴实的食材,却讲究原汁原味、五行调和。一只地道的蒸盆,通常集纳了六种或八种食材,寓意“六六大顺”或“八方来财”。

其制作过程,颇似作画,需层层铺陈。取农家土鸡与鲜排骨焯水去腥,奠定醇厚的底色;干墨鱼去皮切条,增添海味的鲜甜;最妙的是那一

弦歌不辍罗霄山——茶陵历代书院的千年回响

谭金良

在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深处,茶陵是一方独特的地理存在。它是唯一以“茶”命名的行政县,因地处“茶山之阴”,又传说炎帝神农氏“崩葬于茶乡之尾”而得名。这片古老的土地,不仅孕育着千年的茶香,更流淌着绵延不绝的书香。

茶陵虽为山区小县,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其文教之盛,令人惊叹。自宋至清,茶陵共兴建书院(含社学、义社)38所,其中29所延续至今。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下,茶陵学子在科举场上屡创佳绩,历代共考取进士127人,状元、榜眼、会元俱全。这一串串闪光的数字,不仅领跑湘东,更在湖湘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宋韵初啼:
将军剑气里的儒学开篇

“书院”二字,初见于唐。唐玄宗开元年间置丽正殿书院,但这尚属于朝廷藏书修书的官方机构。真正意义上讲学授徒、传道授业的书院,则发轫于五代之白鹿洞,而大盛于两宋。

茶陵的文教之光,便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(1041—1048)被点亮的。最初的县学建在县城西南的狮子山(今茶陵一中所在),南宋时迁至紫微门外。随着程朱理学的南下,白鹿洞书院的学风翻越罗霄山脉,吹进了茶陵的溪谷。自此,茶陵开启了官学与书院“一体化”的历程,宋一代便考取进士71名,元人李邦曾自豪地记录道:“科目兴,士多由学校出……茶陵学校,于湖湘为盛。”

在茶陵书院史上,明经书院的诞生尤为传奇,它不仅是茶陵第一所书院,更承载了一段“武将重文”的古佳话。南宋绍兴二年(1132),名将岳飞率军追剿曹成,驻扎于茶陵火田。彼时战乱虽仍,人心惶惶,而火田当地的望族尹彦德却做出了惊人之举。他宰杀耕牛,置办美酒,连续三天犒劳岳家军,更亲自走入军营,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。这一义举,“令六师之气不战而先夺”,极大地助推了战局的胜利。

岳飞感念尹彦德的豪情,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这位乡绅虽富甲一方,却在文化传承上略显单薄。临别之际,岳飞语重心长地对尹彦德说:“君,长者也。富而无文,当一经教子,后必有显者。”言毕,挥毫泼墨,题写了“一经堂”三字相赠。

这三个字,如同一颗文化的种子,深深埋进了尹氏家族的土壤。数十年后的淳熙十六年(1189),尹彦德之子尹士望不负厚望,扩建“一经堂”,在东侧修筑讲堂,高舍与藏书楼。史载其地“前环流溪,远把高峰,植槐种竹,以为扶游憩之地”。书院落成后,取“经学之传,所望于善学者之有以明之也”之意,定名为“明经书院”。

从“一经堂”到“明经书院”,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与一个耕读家族,在烽火岁月中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契约。此后,严谨的南溪书院、官办的紫微书院相继而起,宋代茶陵书院数量一举跃居湖南第三。那琅琅的读书声,开始压过了山间的雷声。

元代坚守:
乱世孤岛上的文明火种

元朝,对于中国儒生而言,是一个漫长而晦暗的冬天。统治者废除科举,轻视儒术,甚至有“九儒十丐”之说。然而,在这万马齐喑的时代,茶陵却成为

一个文化的异数。

元代统治者虽然在政治上压制汉儒,但并不禁止民间办学,甚至为了笼络人心,偶尔诏谕提倡。茶陵的士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生机,将兴学视为家族存续的根本。这一时期,茶陵书院不降反增,东山、明经、南溪、杜陵等5所书院交相辉映,数量位居湖南第二。

其中,杜陵书院的创建,是茶陵士人风骨的缩影。高院李氏祖李季,曾任茶陵州同知,其后代定居高院龙潭中州。元至元年,做过浙江儒学提举的李璋却卸任归乡,他不愿在元朝官场沉浮,转而创设杜陵书院,自任山长,“日率子弟潜心圣贤,涉猎经传”。到了他的孙李季,同样辞去浙江儒学副提举之职,回乡掌教。这所书院虽毁于元末兵火,存世时间不长,却奇迹般地培养出士子100多人,其中进士3人(李元奎、李朝端、李邦),举人8人。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,杜陵书院如同一座孤岛,守住了儒学的尊严。

而东山书院的成就,则更是堪称文化史上的奇迹。

元大德八年(1304),陈仁子创建东山书院。这不仅是一所教学机构,更是一个拥有360亩学田、集讲学、著述、刻书为一体的学术中心。茶陵地处偏远,却因东山书院而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图书刻印基地。

最令人称道的是,元大德九年(1305),东山书院刊刻了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。这部刻本采用蝴蝶装,开本宏朗,版心精工,字体劲秀,用皮纸精印,被后世公认为《梦溪笔谈》现存最早、最精良的版本。时光流转六百余年,这卷出自茶陵山沟的古籍流落海外。1965年,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,国家不惜重金从香港购回此书。如今,它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珍本库中,作为中华文明的稀世珍宝,无声地诉说着当年茶陵书院的学术高度与工艺水准。

寒门与望族:
清代科举盛世背后的推手

明代,随着王阳明“心学”的兴起,讲学之风复振。弘治十七年(1504),知州林廷玉倡建五溪书院,设“主敬、行恕、修德、凝道”四斋,以心性之学教化士子。

但茶陵书院真正的鼎盛期,是在清代中晚期。道光之后,茶陵科场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“井喷”。

据统计,从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(1838—1904)的66年间,茶陵共有7人考中进士。这其中,不仅有道光二十五年(1850)的状元翁同龢,还有光绪六年的榜眼曾治孙、光绪二十年的榜眼尹铭铨,以及光绪三十年的会元谭延闓。更不用说那位出身寒门、官至两江总督的谭钟麟。

“茅屋出宰相,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”这些活生生的例子,极大地刺激了茶陵各个家族。无论是名门望族,还是寒素之家,都将办书院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。

石陂刘氏,元明时期曾有“一门五进士”的辉煌(包括翰林学士刘三吾),入清后一度沉寂。为了重振家声,他们在萧锦忠高中状元后,迅速建立翰林书院,试图唤醒家族沉睡的文脉。

河坞周氏,虽非科甲世家,却不甘人后。在同宗周鼎、周焘考中进士后,全族士气大振,集资兴建凤冈书院。在《凤

冈书院记》中,族人毫不掩饰地写道:“将他日身列凤池,名登凤阁……”这种对于功名的赤裸裸的渴望,正是那个时代底层家族向上流动的原动力。

而最为感人的故事,发生在谭氏家族。茶陵谭氏,历代进士多达20余人,是当之无愧的“湖湘望族”。但在光鲜的榜单背后,是无数寒门学子的血泪奋斗。晚清名臣谭钟麟,出生于石床一个贫苦家庭,少年时甚至“家贫不能供粥”。为了读书,他白天在瑞藤仙塾教书糊口,晚上则则居古庙,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。谭延闓在《文勤公行状》中回忆父亲:“诵习常至夜分,所处绝厄厄,非人所堪,而志气弥厉。”

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,让谭钟麟在显达之后,对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。他捐银五百两,置田三百余亩,将石床瑞藤的瑞藤仙塾扩建为书院。他深知,对于像他这样的贫寒子弟,一所免费的学校,往往就是通向广阔世界的唯一桥梁。

除了传统望族,新兴的富裕阶层也加入了办学大军。冬市的苏氏家族,虽无显赫官位,但家底殷实。嘉庆年间,苏家读书人苏联元倡议创办苏氏书院,一家便捐田百亩。后经扩建,苏氏书院拥有正栋三进、房舍八十余间,学田多达一千余亩,其规模之大、资产之丰,稳居茶陵书院之首。

跨越边界的讲台:
龙江书院的客家梦想

清代茶陵书院的繁荣,还体现在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格局上。

在茶陵、酃县(今炎陵)、江西宁冈三县交界的砬市,有一所特殊的龙江书院。这是由茶陵客家人牵头,联合三地客家宗族共同创办的。

作为外来迁徙族群,客家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和通过科举融入主流社会的愿望。龙江书院的建筑布局极讲究,设有明道堂、文星阁,以及启秀、珍席、锦心、漱芳、祥云、步月六斋。从“启秀”到“祥云”“步月”,这些斋名层层递进,寓意着学子从童蒙到秀才,再到平步青云、蟾宫折桂的完整进阶阶梯。

这所书院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,成为湘赣边界客家文化的精神堡垒。在这里,不同籍贯的学子同堂受教,书声琅琅中,寄托着客家人耕读传家、出入人头的集体梦想。后来,这里成为朱毛会师的圣地,那是另一种红色的历史叙事,但其根脉,依然深植于茶陵尊师重教的土壤之中。

至清光绪三十年(1904),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,新学兴起,书院的历史使命渐趋终结。彼时,茶陵境内共修复、续办、创建各类书院29所,数量位居湖南各州县之首。

今天,当我们回望这漫长的千年岁月,茶陵书院留给我们的,不仅仅是那些枯燥的数字或残存的断壁残垣。它是一种精神,是岳飞“一经教子”的殷殷期盼,是东山书院雕版工匠的精益求精,是谭钟麟古庙夜读的寒灯孤影,也是无数茶陵人无论贫富贵贱、战乱兴衰,始终不曾放下的书本。

书院虽已远去,但那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,早已化作茶陵大地上的山山水水。在今日茶陵的校园里,在寻常百姓的厅堂间,我们依然能清晰地听到那穿越千年的弦歌之声,不绝如缕,响彻罗霄。

广告
接待
热线
28835396